在多元世界中的交談——從亞洲教會角度反思《眾位弟兄》通諭

阮美賢◆

[摘要] 面對全球挑戰，教宗方濟各結合他對最弱小者的處境之經驗、觀察和綜合分析，以及他對福音和教會社會訓導傳統的理解，在《眾位弟兄》通諭中，他提出以社會對話來打破人與人之間的隔閡和冷漠的態度。他提出一種包容性願景，跨越國界、宗教、階級和各方面的差異，以尊重、博愛、關懷建立手足情誼和社會友誼，當中涉及建立同理心和慈悲心。而這種價值觀不只適用於個人，更要在從政者身上體現出來，因而通諭重申政治愛德的重要性和必要性。亞洲地區與歐美面對的挑戰有同亦有異，亞洲教會因身處多元文化和宗教處境，擁有豐富的對話經驗，發展了富亞洲特色的三重對話方式，期望達到和諧的願景，因而可以豐富《眾位弟兄》通諭中所強調的對話與人際友愛。

關鍵字：社會對話、人際友愛、亞洲教會、文化及宗教交談

Abstract: In view of global challenges, based on his experiences, observation and analysis of the situation of the most vulnerable, and his understanding of the Gospel and the

◆ 作者是聖神修院神哲學院倫理神學教授及聖神研究中心研究員。

tradition of the Church's social teaching, in his social encyclical *Fratelli Tutti*, Pope Francis suggests employing social dialogue to break down the attitudes of estrangement and indifference of people. He proposes an inclusive vision that transcends borders, religions, classes and various kinds of differences, building fraternity and social friendship with respect, fraternity, and care. This involves nurturing the virtues and attitudes of empathy and compassion. Such values not only apply to individuals, but also to politicians and rulers. Therefore, the encyclical reiterates the importance and necessity of political charity. Moreover, there are similarities and differences between the challenges faced by the Asian region and the West. Situated in a multicultural and multireligious Asia, because of its unique situation and rich experiences in dialogue, the Asian Church has developed a three-fold dialogue method, hoping to achieve a vision of harmony. It can enrich the notions of dialogue and human fraternity emphasized by the encyclical *Fratelli Tutti*.

Keywords: social dialogue, human fraternity, Asian Church, intercultural and interreligious dialogue

1 引言

2022 年 9 月，教宗方濟各探訪了哈薩克，並出席了在努爾蘇丹舉行的「世界宗教領袖大會」。教宗向來自五十個國家共一百多位代表團成員發表了演說，強調宗教在社會中的作用。他指出，宗教不應是難題，而是令社會更和諧地生活的一部分。他認為對超越的追求和博愛的神聖價值，可以激發和闡明需要做出的決定，特別是面對當前的全球挑戰，如戰爭、貧困、氣候變化以及對全球化世界所帶來的福祉的追求。他說：「我們這個時代最大的風險因素，仍然是貧困。只要不平等和不公正繼續肆虐，最嚴重的病毒就不會停止：仇恨、暴力、恐怖主義。」[1] 這條道路是從傾聽最弱小者開始，亦是一條關心人類的道路。但可惜的是，有時候宗教卻被視為這些病毒的源頭。

執筆時烏克蘭戰事持續且得到某些宗教領袖支持，[2] 世界各地亦因各種各樣的衝突和發展失衡，繼而出現大量移民、尋求庇護者和難民，以至一些西方國家的極右政黨看中了當地人對外來移居者的排斥和恐懼，提出反移民言論和政策且得到人民支持。至於亞洲，不少地方亦因種種矛盾衝突，引致社會動盪和政治危機，並因發展不平衡而出現大量移民工甚至難民。面對這情境，教宗方濟各的以

1 〈教宗致宗教領袖：神聖不是權力的支柱〉，*Asianews*，2022 年 9 月 14 日，https://www.asianews.it/news-en/Pope-to-religious-leaders:-the-sacred-is-not-the-prop-of-power-56652.html（下載於 2022 年 9 月 16 日）。

2 張瑞邦，〈俄羅斯東正教牧首支持出兵烏克蘭，引發教會分裂危機〉，《關鍵評論》，2022 年 5 月 18 日，https://www.thenewslens.com/article/167002（下載於 2022 年 9 月 16 日）。

上信息甚具時代意義，值得我們深思。

然而，對於教宗出席世界宗教領袖大會，有反對梵二改革精神的教會領袖及其支持者卻不以為然，認為教宗的觀點讓人們誤以為天主教會像「宗教超級市場」的其中一件貨品，每個人都可以在那裡選擇想要的信仰。這些被視為傳統派或保守派的人士，或許是真誠地尋求保護教會及其教義，但所採用的方法卻是履行規則和嚴格的禮儀公式，而他們的教會模式似乎是排他、判斷性和宗派主義的。他們真誠地相信天主教是唯一真正的宗教，因而認為天主教不需要與其他宗教信仰對話。[3] 此外，有論者認為教宗方濟各有時為了對話，包括與各國當權者對話而妥協，忽視現實中的政治權力不對等，因而可能忽略了被當權者壓迫的弱小者，包括宗教人士。[4]

教宗方濟各並不同意以上觀點，他多次重申對話的重要性。[5] 在哈薩克他曾說：「我們需要其他人，所有人：其他基督宗派的兄弟姊妹，以及與我們不同宗教信仰的人，所有懷著善意的男女。」他強調，「願我們本著謙遜的精神，認識到只有在一起，在對話和相互接受中，才能真正實現造福於所有人的好事。」「如果沒有對話，要麼是無

3 Robert Mickens, “Francis Continues His Push for a Humbler More Open Church”, *La Croix*, 17 September 2022.

4 Benedict Rogers, “Vatican Should Talk to China But Not at Any Price”, *UCA News*, 3 September 2021; Jason Horowitz, “In Myanmar, Pope Francis Calls for Peace without Saying Rohingya”, *New York Times*, 28 November 2017.

5 “Pope: In Myanmar and Bangladesh I Encouraged Dialogue and Witness”, *Asianews*, 6 December 2017.

知，要麼是戰爭。」[6]

其實，教宗方濟各自 2013 年 3 月上任以來，透過他的說話、文字和行動，處處表達了他對貧窮人、邊緣社群和整個受造界的關懷和愛惜，並抨擊「冷漠的全球化」現象。[7] 他強調要與不同文化和宗教的人士對話和合作，試圖紓解各種問題。他經常身體力行，在不同場合和他的牧函中表達對弱勢社群，特別是流落他方的移民和難民的關注。凡此種種都反映了他一直關注有關手足情誼與人際友愛的議題，以及採用對話的方式回應各種問題。而 2020 年頒布的《眾位弟兄》通諭——論手足情誼與人際友愛，[8] 既匯集了教宗過去的言論，亦將這些言論置於更廣闊的脈絡中作反思。

回應社會挑戰和問題有很多方法，為何方濟各主張以對話作為途徑達到人際友愛？他的對話對象是誰？對話之目的和背後的理念是什麼？有否因對話而忽略了被壓迫者？對亞洲教會有何啟迪？而身處多元宗教和文化處境中的亞洲社會，擁有豐富的交談經驗，這些經驗有何值得我們參考？本文嘗試從教宗方濟各的《眾位弟兄》通諭和亞

6 〈教宗致宗教領袖：神聖不是權力的支柱〉。

7 John Hooper, “Pope Attacks ‘Globalisation of Indifference’ in Lampedusa Visit”, *The Guardian*, 8 July 2013; Devin Watkins, “Pope to Celebrate Mass for 7th Anniversary of Lampedusa Visit”, *Vatican News*, 6 July 2020.

8 Pope Francis, *Encyclical Letter Fratelli Tutti*, on Fraternity and Social Friendship, 2020. 雖然通諭的中文名稱譯為「眾位弟兄」和「兄弟情誼」，但為了更具包容性，除了通諭本身的名稱外，本文一律採用「手足情誼」。

洲主教團協會的文件探討以上問題，以及反省在各種社會挑戰下，社會、文化和宗教對話的重要性。

2 教宗方濟各：跨越差異，社會對話，人際友愛

《眾位弟兄》通諭採用了天主教社會訓導一直採用的「觀察—判斷—行動」方法，[9] 即首先探討當今世界有礙普世手足情誼發展的某些趨勢，以及分析衝突和不義的原因，這些都是教會面對的挑戰（第一章）；然後，以福音中慈善的撒瑪黎雅人的比喻（第二章）、信仰傳統中的價值觀（第三、四章）、教宗的政治哲學觀（第五章）、社會文化價值（第六章），特別強調對話和人際友愛（第七章）作為對待他人和制定各種經濟、政治、社會和信仰項目的準繩，以及用來重新審視我們的生活方式、人際關係、社會結構，最重要的是審視我們的生命意義，提醒大家如何在仔細辨別後作出倫理抉擇（# 33）。最後，通諭指出宗教具有為世界的手足情誼服務的責任和使命（第八章），即陪伴生命，維持希望，成為團結的標記，並且搭建橋梁，拆毀圍牆，播種和好（# 276）。

2.1 對話的背景：邊界和圍牆，漠視他人

《眾位弟兄》通諭開首便探討了教會面對的挑戰，在

9 筆者在另一篇文章概括地討論了《眾位弟兄》通諭中採用的「觀察—判斷—行動」方法，除了與另一份文件對談，亦應用在香港的少數族裔議題上。參閱阮美賢，〈以愛德、良善和彼此連繫接納受苦者—《人類兄弟情誼》文件和教宗方濟各的《眾位弟兄》通諭之對談〉，香港中文大學「人類兄弟情誼與社會友誼」宗教交談研討會，2021年12月9日。

這些挑戰中，無論是實際上或象徵性的，個人和國家越來越傾向於建立邊界和圍牆，把世界上最脆弱的人分隔、孤立和排斥（# 27）[10]，有礙普世手足情誼發展。教宗方濟各在通諭中對消費主義、資本主義、民族主義、仇外心理等意識形態一律作出批評，也表明了在各國人民之間架起橋樑的重要性。他指出種種問題的成因，關鍵在於人類良心的遲鈍和漠不關心。「現今世界，歸屬人類大家庭的意識在減弱 … 相反地，普遍存在的是冷漠無情、耽於安逸和遍及全球的冷漠」（# 30），失去了對其他人的責任感。

方濟各在整份通諭中都談到冷漠和無動於衷的邪惡，這是他在講道和發表的訓導中反覆出現的主題。這種態度不僅使人無法培養慈悲心——願意與受苦的人團結一致——而且會促進個人主義，導致分離，妨礙建立真正的關係。結果不僅是社會分裂，而且是巨大的痛苦，窮人和弱勢群體對此感受最為深刻。

2.2 對話的特色：包容性願景

面對上述情況，方濟各在通諭開宗明義指出，發表該通諭之目的，是期望在面對當前摒除或漠視他人的生活方式時，人們能夠以嶄新的手足情誼和人際友愛態度作出回應，付之實行，而非只說空話。為方濟各來說，手足情誼具普世幅度，故應容納所有人，無分國籍、種族、宗教或文化背景。他更希望藉此通諭與其他心懷善念者對話（# 6，128）。這種視所有人為兄弟姊妹的態度，在當今世界的處境是一個重要的態度。

10 除註明外，括號內的號碼均來自《眾位弟兄》通諭。

這種跨越國界、跨越差異、跨越宗教的包容性願景，可追溯到方濟各的《願祢受讚頌》通諭，甚至更早的教宗若望廿三的《和平於世》通諭。這些文件不僅面向天主教徒和其他基督徒，而且面向所有善意的人，期望他們不論宗教傳統或原籍國，「以新的眼光看待事物並製定新的應對措施」，來應對我們面前的挑戰（# 128）。

2.3 社會對話的態度

《眾位弟兄》通諭強調跨越國界的社會友誼；社會友誼是博愛、關懷和仁慈以及尋求正確關係的另一個名稱。這種關係使我們對他人敏感並尊重他人，不會扭曲他人的形象。熱情好客，以互惠的方式跟社會中的弱勢群體團結一致。在通諭中，教宗多次呼籲大家發展一種「相遇的文化」，在團體內彼此融合、充實和啟發，從每一個人身上學習，從而克服使人彼此對立的分歧（# 215）。而愛是建立「相遇文化」的必要基礎，這意味著我們作為人民，應該「熱衷於彼此相遇、設法彼此連繫、架設橋梁，並計劃一個所有人都可以投身的事業，從而形成某種對生命的期許和生活方式（# 216）。」

方濟各提出，如要與人相遇和互相幫助，我們需要「對話」，包括世代之間的對話、人民之間的對話、給予和接受的能力、對真理保持開放的態度（# 199）。對話綜合了互相接近、表達自己、互相聆聽、互相注視、互相認識、互相了解、尋求共識的意思（# 198）。為進行真誠的社會對話，必須尊重他人觀點，接受對方抱有的信念或關注可能是合理的（# 203）。在多元社會中，為認清甚麼事物

總是應得到確定和尊重並凌駕短暫的共識，對話是最佳途徑。對話必須獲得理智、理性的論據、各種不同的角度，而且是被不同範疇的知識和觀點所作出的貢獻充實和啟發（# 211）。而無論在任何情況下，都必須尊重他人的尊嚴（# 213）。

2.4 培養同理心和慈悲心

方濟各認為，跨越國界和文化背景並願意接觸對方，必須「對別人的脆弱感同身受」，這樣才會「拒絕建立一個排斥他人的社會，讓自己成為近人，扶持和看顧倒在路旁的人，為共同福祉作出貢獻」（# 67）。正如聖保祿宗徒所說：「應與喜樂的一同喜樂，與哭泣的一同哭泣」（羅 12:15）。方濟各認為做到這點，就是能夠對別人的經歷感同身受了。然則，如何能做到這點呢？

做到感同身受，關鍵在培養慈悲心和同理心，從別人的角度出發瞭解對方的需要。同理心是指能夠站在他人的角度思考和處理問題，嘗試了解其他人的想法和感受，與他們進行情感交流，並關心他們的幸福。同理心通常還包括對他人的感受做出適當反應的能力，例如憐憫和出於同情的幫助等。[11]

在新約的福音書中，記載了不少耶穌與貧窮受苦者的相遇和他的教導，都反映出他的慈悲特性和同理心。對基督徒來說，耶穌的教導具有特別意義，值得效法。例如，

11 參考 “Empathy”, Standard Encyclopedia of Philosophy, https://plato.stanford.edu/entries/empathy/ [accessed 15 September 2022].

福音中的善心撒瑪黎雅人比喻（路 10:25-37）；耶穌眼看群眾跟隨他，知道他們已疲累，就對他們動了憐憫之心（瑪 9:36）；本著慈悲心，耶穌治癒被領到他面前的病人（瑪 14:14）；他又以寥寥可數的餅和魚令大量群眾飽飫（瑪 15:37）。[12] 耶穌又治好被社會邊緣化和歧視的人，以及救助被壓迫的婦女（若 8:1-11）和復活寡婦的兒子（路 7:15）。這些病人或困苦者在當時都被視為罪人，患病不被可憐同情，但耶穌卻不理會這些約定俗成的偏見，以慈悲行動治癒他們。耶穌所行的這些神蹟和行動，都是他的慈悲教導。而這些行動的動機，正因為他對受苦者有一份同理心，洞悉其內心需要，因而將這份感動化為行動。[13]

方濟各勸勉大家要感同身受，培養慈悲憐憫之心，實踐手足情誼，承擔別人的痛苦，努力不懈地接納、融合和扶持倒下的人（# 77）。然則，如何培養呢？從德行倫理的角度，基督徒一方面以祈禱的心情默想這些故事，深化耶穌的教導；另一方面，以「默觀」的態度去觀察和看清楚真實的世界，親自走到邊緣，虛心聆聽被忽略、蔑視、排斥、踐踏、奴役和暴力對待的人的經驗和故事，[14] 在現實生活中培養德行。

以慈善的撒瑪黎雅人比喻為例，一個外邦人跨越種族、文化、階級主動去照顧一位與自己大不同的傷者，方濟各

12 教宗方濟各，《慈悲面容》慈悲特殊禧年詔書，2015，第 8 節。

13 Maureen H. O'Connell, *Compassion: Loving Our Neighbor in An Age of Globalization* (Maryknoll, NY: Orbis, 2009).

14 Pope Francis and Austin Ivereigh, *Let Us Dream: The Path to a Better Future* (London: Simon & Schuster, 2020), pp. 12, 15.

強調，類似受創傷和掙扎的故事正不斷重演，就如今天我們所看見的（# 69）。倫理神學家斯波恩認為這比喻讓我們看到耶穌的世界的一扇窗，以倫理想像來閱讀這故事，它成為映照我們的現實處境的鏡子。撒瑪黎雅人的同理心和慈悲心打通了其領悟力和行動力，對受傷者的憐憫不是短暫的同情，而是持續的關顧。默想這比喻可以讓我們被耶穌的言行擴展我們的視野和憐憫心的界限，不再被恐懼、怨恨、麻煩而阻礙了慈悲心的實踐，促使我們以行動伸出援手，打破人與人之間的隔漠和藩籬。[15] 與此同時，我們要主動接觸社會的邊緣社群和改過自身的人，在日常生活中效法耶穌的待人態度，給予別人機會融入社會，接納包容他們，並且就這些實際境況作反思，漸漸地便可為我們帶來轉化，重建更廣闊的人際關係和社會友誼。

正如方濟各所言，透過撒瑪黎雅人的比喻，耶穌邀請我們重新發現自己的召叫：作為本國和世界的公民，建立嶄新的社會關係，發現「我們每一個人的生命都與其他人的生命緊密相連：生命不是時間的流逝，而是相遇的時期（# 66）。」

2.5 政治愛德

回應社會挑戰，除了個人轉化，具有權力的執政者和社會領袖的角色亦很重要，他們也是社會對話的對象。因此，通諭沒有忽略結構性因素和國家的責任。方濟各認為，愛德不僅存在於個人關係之中，當我們與其他人聯手，為

15 William Spohn, *Go and Do Likewise: Jesus and Ethics* (New York: Continuum, 1999), pp. 90–91.

眾人開展手足情誼和正義的社會進程，我們便是在實踐更廣闊的愛德——政治愛德。這是致力建立一個以社會政治愛德為靈魂的社會政治秩序，以尋求公益為主（# 180）。這是愛德的最高表現之一。引用他自己較早前發出的《願祢受讚頌》通諭，他指出，「我們所需要的政治運作應是具有廣闊的願景，具備嶄新的、整合的及跨學科領域的能力來處理各項危機。」[16] 他期望的是「健全的政治體制 … 有能力改革和協調不同的機構，具有良好的辦事方式，克服不正當的壓力和官僚作風的懈怠。」[17] 該體制「在困難時刻，能高舉崇高的原則，以大眾的長遠福祉為依歸，真正的治國之道始得以發揮」（# 177）。

承接教宗本篤十六世對政治愛德的理解，愛不僅表現為親密的關係，也體現於社會、經濟、政治的關係上，[18] 方濟各指出，「充滿彼此關懷及微小動作的愛，也有其屬於公民和政治的一面，這份愛能彰顯在所有尋求建立更美好世界的每個行動中（# 169）。」這種政治愛德的先決條件在於擁有成熟的社會觸覺，能夠超越任何個人主義的思維；啟發人以新的方法去處理今日世界的問題，從內更新各種結構、社會組織和法律系統（# 183）。「受意志命令」的愛，指向建立更健全的體制、更正義的法規和提供更大支援的架構的愛德行動。因此，「致力組織及建構社會，好使近人不再貧乏，也是愛的行動。」（# 186）

通諭亦強調，需要「不計較回報的手足情誼」，或者

16 教宗方濟各，《願祢受讚頌》通諭，2015 年 5 月 24 日，197 號。
17 教宗方濟各，《願祢受讚頌》通諭，181 號。
18 教宗本篤十六，《在真理中實踐愛德》通諭，2009 年 6 月 29 日，2 號。

為那些受苦最深的人搭建通往更美好生活的橋樑，而不期望回報（# 140）。方濟各指出，只有當我們不將自己變成自我封閉的民族主義者，而是願意作為更大的「人類大家庭」的一分子，才會有未來。「你們白白得來的，也要白白分施。」（瑪 10:8）他補充說：「只有當社會和政治文化不計較回報地接納外來者，才能創建未來（# 141）。」

2.6 從政者的責任

方濟各曾說，「我們不應期望統治者給我們所需要的一切，這太天真了。我們應共同承擔責任，一起開展和實現新的流程和轉變。」但他也明確指出從政者有其責任，有迫切需要解決所有危害基本人權的問題，而且從政者必須關顧弱勢者，援助最邊緣和最困苦的人，讓他們重拾尊嚴（# 188）。他認為政治領袖應懂得如何傾聽其他人的觀點，讓每個人都有自己的空間，以犧牲和忍耐的精神行事，讓所有人都可在其中找到自己的位置（# 190），而優秀的從政者應踏出第一步，讓所有人都有機會發聲（# 191）。他建議我們應該以開放的心態和與願意共建未來的人對話，即使是那些與我們意見不同的人。

在天主教社會訓導傳統中，在實行民主的過程中，人民的參與固然重要，但統治者的作用也很重要。願意為人民服務，關心人民的需要，尊重他們的基本權利，傾聽人民的聲音，是民主社會良好治理的重要因素。行使權力的人應該作為一種服務。耶穌告訴我們，「誰若想做第一個，他就得做眾人中最末的一個，並要做眾人的僕役」（谷 9:35）。政治領導人有責任為人民服務，實現社會的公益。

基於這種觀點，方濟各樂意與政治和社會領袖對話，希望向他們傳遞這些既是信仰亦是普世性的價值觀。

在中國文化的儒家傳統中，也有對執政者或君主的期望。例如，孔子對仁的教導延伸到政治秩序，被定義為仁政。一個政府應該以德治國，用道德勸說，而不是用懲罰。「為政以德，譬如北辰，居其所而眾星拱之」；「導之以政，齊之以刑，民免而無恥；導之以德，齊之以禮，有恥且格。」[19] 當被問及仁君的角色和作用時，孔子最著名的弟子孟子說：「民為貴，社稷次之（表示政治權威或國家在後），君為輕。」孟子進一步說，「舉直措諸枉，則民服；舉枉措諸直，則民不服。」[20] 如果一個君主真正行仁，提拔正直的人，人民也會尊重和服從君主，敢於表達自己的意見。君子仁義正直，人民就會服從，國家就安定了。否則，國家將衰敗滅亡。同時，政治領袖要樹立好榜樣，以尊重和仁慈公正地對待老百姓。執政者在老百姓面前莊重，老百姓就會恭敬；執政者孝順父母，慈愛幼小，老百姓就會忠誠；執政者提拔好人，教育能力弱的人，老百姓就會勤勉。「臨之以莊，則敬；孝慈，則忠；舉善而教不能，則勸。」[21]

2.7 小結

透過這份最新的通諭，以及方濟各的牧民行動，我們可以看到，基於方濟各對當今世界的現象和最弱小者面對

19 孔子，《論語》為政篇，2:1, 3。
20 孔子，《論語》為政篇，2:19。
21 孔子，《論語》為政篇，2:20。

的處境之觀察和綜合分析，結合他對福音和教會社會訓導傳統的理解，他認為必須以社會對話來打破人與人之間的隔閡和冷漠的態度。他提出一種包容性願景，跨越國界、宗教、階級和各方面的差異，以尊重、博愛、關懷建立手足情誼和社會友誼，當中涉及建立同理心和慈悲心。而這種價值觀不只適用於個人，更要在從政者身上體現出來，因而通諭重申政治愛德的重要性和必要性。與執政者對話，是向他們傳遞人性尊嚴和大眾福祉的信息，從而邁向人際友愛的重要一步。

亞洲地區與歐美面對的挑戰有同亦有異，亞洲教會既分享社會訓導的願景，亦因其獨特處境發展了富亞洲特色的對話方式和觀點，可以豐富《眾位弟兄》通諭所強調的對話與人際友愛，下文將作探討。

3 亞洲教會：和諧與三重對話

亞洲是多個宗教的發源地，亦有不同的文化和種族存在其中，加上過去受著殖民者統治，可說它是一個多元和多變的地區。在宗教、種族、語言和文化多元的亞洲，追求和諧是亞洲教會一項重要工作，而對話或交談則是推廣和諧社會的重要方式之一。教會需要不間斷地與當地人民、文化、宗教接觸和交談，讓教會真正處境化和本地化，這樣亞洲人民或處於不同地方教會的人民，才會更欣賞後殖民的亞洲教會。

亞洲主教團協會（簡稱 FABC）[22] 自從在 1972 年成

22 亞洲主教團協會 (Federation of Asian Bishops' Conferences，簡稱

立以來一直致力於探索一種具亞洲特色的教會模式。在台北舉行的第一次全體會議中（主題是「在現代亞洲的福傳」），亞洲主教和神學家已經就三重對話的內容和如何推行進行了探討。[23] 有神學家指出，FABC 最重要的神學貢獻，正是在於它認為在亞洲要成為教會，需要教會與亞洲的文化、宗教和窮人進行三重對話。三重對話被運用於在亞洲做神學的方式，也是教會落實其使命的方式。簡而言之，這是在亞洲成為教會的方式。[24] 而在 1995 年於印尼舉行的全體大會中，FABC 正式通過了名為「臨在於亞洲的教會的新方式」（A New Way of Being Church in Asia）的願景，它嘗試表達亞洲教會的希望與期盼、可達致的方式和伴隨的靈修觀。為亞洲教會來說，傳福音的中心是交談和以聖言作見證，因此，FABC 採取一種新方式，建構神學及計劃牧民指引，在亞洲多元的處境中，將福音信息處境化。[25]

FABC) 於 1972 年成立，由亞洲國家的主教團組成，代表近 30 個國家，是一個亞洲的跨國性教會組織，亦被視為唯一可以代表亞洲天主教會和 1.2 億亞洲天主教徒的泛亞洲機構。有關歷史和組織活動請參考 FABC 網頁 https://fabc.org/。

23 First FABC Plenary Assembly (FABC I), "Evangelization in Modern Day Asia", Taipei, Taiwan, 1974, no. 13-28, in *Fifty Years of Asian Pastoral Guidance*, ed. Vimal Tirimanna (Bangkok: Hemmarus Prepress Co., 2020), pp. 4-7.

24 Edmund Kee-Fook Chia, *World Christianity Encounters World Religions: A Summa of Interfaith Dialogue* (Collegeville, MN: Liturgical Press Academic, 2018), p. 141.

25 The Fifth FABC Plenary Assembly (FABC V), "The Emerging Challenges to the Church in Asia in the 1990s: A Call to Respond", Bandung, Indonesia, 1990, no. 8, in *Fifty Years of Asian Pastoral Guidance*, ed. Vimal Tirimanna (Bangkok: Hemmarus Prepress Co.,

3.1 和諧的願景

FABC 認為，和諧是亞洲人的人生願景和價值觀，它體現了人類互動中看到的秩序、幸福、正義和愛的現實。和諧是源自社會中不同的網絡關係所組成的信念，這些關係之間有着各式各樣的交往和聯繫。和諧可突破分裂和衝突的藩籬，向其他宗教信仰以愛和合作的態度伸出友誼之手。這樣，多元主義與多樣性不再被視為問題，而是被視為豐富；即使衝突和張力亦可被視為富創造力，為生命帶來互動改變。[26] 對和諧的看法促使 FABC 以對話來達到和諧，務求令亞洲人民達至更團結；這好比教會作為聖事，作為一個統一和諧的有形標記。[27]

交談之目的可以說是為了互相瞭解、和諧共處、加強團結、信任、友愛、正義、和平和分享亞洲精神價值的豐盛。FABC 經常強調三重對話時必須以謙虛、尊敬和友善

2020), pp. 108-109. 參閱阮美賢，〈亞洲教會文獻的發展與重點〉，《正義道中尋 — 天主教社會訓導簡易本》，（香港：香港天主教正義和平委員會，2006 年增修版），頁 19。

26 Office of Ecumenical and Interreligious Dialogue (OEIA), "Theology of Harmony", in *Dialogue: Resource Manuel for Catholics in Asia* (Manila & Thailand: FABC-OEIA, 2001), p. 118; OEIA, "A Call to Harmony", Thailand, April 1994, in *For All the Peoples of Asia*, vol.2, p. 151.

27 OEIA, "Working Together for Harmony in God's World", Bishop Institute for Interreligious Dialogue (BIRA) Documents (Pakistan, October 1992), in *For All the Peoples of Asia*, vol. II, ed. Franz-Josef Eilers (Quezon City: Claretian Publications, 1997), p. 144; OEIA, "Asian Christian Perspectives on Harmony", no. 6, in *For All the Peoples of Asia*, vol. 2, p. 298.

的態度進行。[28]

3.2 與亞洲文化交談

FABC 的主要重點是建立一個地方教會，它不僅由本地基督徒組成，而且還包含亞洲本地的價值觀、精神和文化。與文化交談亦即令教會本地化，教會必須在學習了解和尊重當地文化的同時，發現已埋在文化和活傳統中的聖言種子。投入當地人民生活之中，正是宗教本地化的必經過程，這亦是聖言富創意的表達。對亞洲教會來說，本地教會（local church）是指「一個本地化（inculturated）、本土化（indigeneous）和臨在於人民之中（incarnate in a people）的教會。具體來說，這指向一個與當地傳統、文化和宗教持續不斷地、以謙虛和友愛態度交談的教會；簡言之，即與人民的生活實況交談，並願意視人民的歷史和生活為自己的歷史和生活。」[29] 這一出發點影響著 FABC 使它能以一種新方式臨在於亞洲社會中，這只有通過與亞洲豐富的文化傳統進行接觸或對話來實現。地方教會必須通過人民熟悉的方式，使福音信息傳遞給亞洲人民。[30]

3.3 與亞洲宗教交談

宗教是文化的重要組成部分，因此，任何宗教間的對

28 阮美賢，〈亞洲教會文獻的發展與重點〉，頁 21。

29 FABC 1, “Evangelization in Modern Day Asia”, no. 9. 參閱「在現代亞洲的福傳」，《正義道中尋 — 天主教社會訓導簡易本》，頁 119。

30 FABC 1, “Evangelization in Modern Day Asia”, no. 12. Also see Chia, *World Christianity Encounters World Religions*, p. 142.

話也必須被視為一種跨文化交流的形式。[31] 亞洲是世界許多宗教的發源地，宗教與人民生活的關係密不可分，而且亞洲大多數人信奉基督宗教以外的宗教。在大多數亞洲國家，基督徒是少數，有些不到人口的百分之一。因此，亞洲教會必須與亞洲的宗教傳統進行對話。FABC 指出，「在宗教交談中，我們接納各亞洲宗教信仰傳統為天主救贖工程裡重要的、正面的元素，肯定其精神與倫理的價值。很多世紀以來，她們是我們祖先的寶藏，我們這一代繼續從中獲得光照和力量。她們曾經是、也繼續是亞洲人民內心最崇高的渴求之表達，並是人們默觀和祈禱之所。她們參與塑造亞洲的歷史與文化。」[32]

FABC 亦認為，透過與亞洲宗教的交談，可以在當中發現天主聖言的種籽，讓我們接觸到人民內心最深處的具體表達，促使我們找到表達和活出基督信仰的真實方式，並向我們啟示基督信仰的豐盛之處。此外，宗教交談在聖言的光照下將教導我們，基督信仰從這些宗教傳統所獲得的東西，以及在她們中需要淨化、治療及滿全的地方。而基督信仰則可為她們提供對人之價值、對人類救贖之社會幅度的一種理解。[33] 這些洞見都是亞洲教會成員，在參與過 FABC 或其他團體舉辦的多次與不同宗教人士交談的活

31 Franz-Josef Eilers, *Communicating Between Cultures: An Introduction to Intercultural Communication*, 4th updated ed. (Manila: Logos (Divine Word) Publications, 2012), p. 189.

32 FABC 1, "Evangelization in Modern Day Asia," no. 14.

33 FABC 1, "Evangelization in Modern Day Asia," nos. 16-18. 參閱「在現代亞洲的福傳」，《正義道中尋 — 天主教社會訓導簡易本》，頁 119。

動和研習後得到的共識。[34]

3.4 與貧窮人交談

在亞洲的背景下，本地化是通過教會與其人民的互動來完成的。儘管各個國家的貧困程度差別很大，但即使在較發達的東亞國家，貧富差距也異常巨大。因此，教會的優先事項之一必須是積極關懷亞洲的許多貧窮人。貧窮人的呼喊和歡笑令我們對這些兄弟姊妹更具敏感度。透過與他們的生命交談，亞洲教會更瞭解他們的需要和期望，及參與改革令他們受壓迫的制度。

FABC 指出，本地教會與亞洲人民交談，便是與窮人交談，因為亞洲大部分由貧窮的群眾組成。貧窮不在人的價值觀、品質上，也不在人的潛力上。而是由於他們生活在不公義的社會、經濟和政治架構的壓迫中，被剝奪了獲取物質及資源以創造真正人性生命的途徑。

這種交談有兩個相關的幅度，一方面是一種「生命的交談」，教會內的信徒被福音轉化，願意理解亞洲人民的貧窮、剝削與壓迫的狀況和真實經驗，要求我們不僅「為」他們，而是「和」他們一起，並從中學習他們真正的需要和渴望，明白到他們是有能力改變使其處於剝削及無力的

34 有關活動內容可參閱 FABC Office of Ecumenical and Interreligious Dialogue (OEIA) 的活動報告，特別是 Bishop Institute for Interreligious Dialogue (BIRA)，見 FABC 網頁 https://fabc.org/oeia/; 亦可參閱 *For All the Peoples of Asia* 系列 (Claretian Publications) 中 OEIA 的活動報告。

結構與處境。[35] 另一方面是站在貧窮人一方，與他們一起尋求改變和爭取改革不公義的社會結構，讓他們參與於關乎其生活的決策，從而獲得解放；而且要喚醒既得利益者和有權力人士，轉化他們關心貧窮者，期望他們歸向正義。這是教會對社會公義的真正承擔和努力，一種行動性的、有組織的「信仰行動和反省」（意識醒覺）。[36]

與窮人站在一起對亞洲的教會尤其重要，因為在殖民時代，正是西方教會對非基督教的亞洲地區進行了征服、掠奪和統治等不義行為，這使亞洲許多國家分裂和貧窮。亞洲教會必須分擔責任，減輕亞洲窮人的苦難。與窮人的接觸或對話，可說是後殖民時代亞洲教會的一個組成部分，這是其中一種生活在基督內成為門徒的亞洲方式。[37] 亞洲基督徒遵照福音的精神和要求，致力於正義的工作，意識到尋求成聖與尋求正義、傳揚福音與促進人類發展及解放之間並非對立，反而構成今日亞洲宣講福音的重要元素。

FABC 的人類發展辦事處 Office for Human Development（OHD）曾舉辦不少工作坊、生活體驗及研討會等，接觸及瞭解貧窮及弱勢社群的處境及探討地方教會的牧民回應方式。[38]

35 FABC 1, “Evangelization in Modern Day Asia”, nos. 19-20.

36 FABC 1, “Evangelization in Modern Day Asia”, no. 21.

37 Chia, *World Christianity Encounters World Religions*, p. 145.

38 有關活動可參閱 FABC Office for Human Development（OHD）的活動報告，包括一連串社會行動工作坊，見 FABC 網頁 https://fabc.org/ohd/; 亦可參閱 *For All the Peoples of Asia* 系列（Claretian Publications）中 OHD 的活動報告。

3.5 小結

總結來說，亞洲教會的獨特之處在於其規模雖小但充滿活力的基督徒團體，它擁有與其他宗教、文化和貧窮人接觸和對話的豐富經驗。上述的內容都是基於實際經驗總結出來，不只是流於文字。多年來，它學會了向那些已經非常滿足於自己的宗教的非基督徒傳福音的方法，以及如何在沒有興趣看到基督教成長的社會和政治力量之間進行談判。FABC 對其他宗教和文化在上主的神聖和救贖計劃中的作用採取了相當正面的評價。這種欣賞的基礎是全人類只有一個救贖計劃的神學信念，沒有人被排除在這個神聖計劃之外。因此，基督徒有責任不僅要辨別上主的拯救活動是如何運作，並在其他宗教中表現出來，更重要的是，要認真辨別基督宗教在上主的普世救恩計劃中的角色，實踐在地上建設天國的使命。[39]

4 總結

教宗方濟各在《眾位弟兄》通諭中，提出以社會對話來打破人與人之間的隔閡和冷漠的態度。他提出一種包容性願景，跨越國界，建立橋樑，建立手足情誼和社會友誼。而這種價值觀同時具有個人和社會政治幅度。擁有豐富對話經驗的亞洲教會，因其多元文化和宗教背境，發展了富亞洲特色的三重對話，期望達到和諧的願景，這些亞洲經驗都可以豐富通諭所強調的對話與人際友愛，亦可以將通諭中的社會對話處境化。

39 Chia, *World Christianity Encounters World Religions*, pp. 145-146.

維持人與人群體與群體之間的溝通和了解，對話是其中一種重要且有效的方式，但不是唯一一種回應社會問題的方式。對話有其價值，但是雙方必須有意願參與其中，而且願意以平等和開放的態度對話。往往有權力的一方需要釋出更大的善意參與其中，否則對話未必得到預期的效果。方濟各的通諭和亞洲教會提出的對話方式，是期望達致建立社會中的手足情誼和人際友愛，並期望懷著善意的人一起促進社會對話，令世界變得更和諧和美善，這仍有待各方繼續努力實踐和應用。